




常建华 主编

中国城市社会史
名篇精读



Zhongguo
Chengshi Shehuishi
Mingpian Jingdu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城市社会史 名篇精读

常建华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精读 / 常建华主编.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8
ISBN 978-7-5444-9891-3

I. ①中… II. ①常… III. ①城市 - 社会发展史 - 中国 - 文集
IV. ①K92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30341号



责任编辑 董龙凯


封面设计 陆 弦

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精读
常建华 主编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5 插页 1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2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9891-3/C·0031
定 价 59.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使得城市生活方式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普遍选择。然而,中国现代城市生活并非完全是现代化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是传统社会城市生活的延续与更新。汉唐时代的长安、洛阳,宋以后的苏州、杭州,明清北京、南京等,都以都市繁华闻名于世,近代沿海商埠上海、天津的崛起,属于对外开放与发展工商的产物,具有近代城市的明显特色。了解中国城市的前世,有利于认识中国城市的今生。

为此,我们编选了有关中国城市史的六篇名作,以方便学生从事城市史的学研以及社会人士阅读。其中包括三位中国学者和三位美日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注重断代性的整体论述,如对宋、清城市研究的选文即是;也注重单体城市社会的研究,如长安、苏州、天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先驱、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学者牟复礼有关苏州的论文,是首次译成中文,相信读者会有很大兴趣。

秦汉史、社会史专家王子今教授的《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讨论城市空间问题,这也是城市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徐畅副教授的导读信息量较大,不仅讨论西汉长安的自然空间,也讨论了社会空间,对于学术界的争论予以介绍,将读者带到学术研究的前沿。除了直接分析王子今教授收入本书的论文外,也介绍了他的相关论文,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王子今教授的研究。徐畅对于王文结构的介绍,言简意赅,往往抓住关键例证说明,给人以深刻印象。

日本中央大学妹尾达彦教授是唐代城市社会史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他对都市史的探讨是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开始的。妹尾教

授《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一文,通过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的论述,指出长安城的街东与街西生活面貌与文化形象迥异,特别呈现出当时的平民文化。夏炎教授的导读归纳了妹尾达彦教授城市社会史的研究范式为“结构—社会”的模式,并指出妹尾教授从《李娃传》男主角的视角发现人物在不同空间之间的移动,赋予传统史料以新的生命。

包伟民教授所著《宋代城市研究》是宋代城市研究的力作,我们选择其中的“发展瓶颈”部分介绍给读者。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宋史学者杨芹博士与周鑫副研究员的导读首先介绍了全书,指出该书是作者“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之后,以更为全面、更为综合的视角来观察和阐述两宋时期城市的发展历程。作者不仅对于宋代“城市革命”“城市化”等理论进行反思,而且通过睿智而仔细的学术考证,纠正了以往似是而非的诸多说法,有助于更加真实地认识宋代城市。本文“导读”认为,“第八章《发展瓶颈》是全书最能体现其自觉批判思维、多元观察视角与娴熟历史学技艺的一章。”故而,推荐给大家一同欣赏。

施坚雅教授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在中国广为人知,该书收入牟复礼教授《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一文。此外,牟复礼还对苏州城市史有精深的研究,1973年发表于荷兰《莱斯大学学报》的《中国城市史一千年:苏州城的形态、时间和空间观念》一文,与牟氏研究南京的文章堪称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双璧。该文长期没有中文译本,中文学者往往仅能从西方学者的评述中略窥一二。本书将该文译出并加以导读,不仅有益于国内苏州城市史研究,而且可使我们系统认识牟氏关于中国城市的整体思想。“导读”准确地抓住了牟文的特色,一是作者从比较文化的视野看待中国城市,发现中国城市不同于西方城市以及城市理论的特色,二是作者提出中国城市“城乡连续统一体”的概念。“导读”不仅为此提炼了牟文的主旨与卓见,而且从学术史的角度予以解读。特别是关于“城乡连续统一体”理论与苏州城市史的研究,既追述了牟复礼最早在研究南京的论文中提出的

“城乡连续统一体”的问题,又介绍了后来西方学者徐亦农《时空中的中国城市:苏州城市形态的发展》这一重要论文和牟文理论与苏州研究的关联,也介绍了中国学者相关苏州城市史的研究。不仅如此,“导读”对于牟复礼城市史研究与施坚雅城市史研究关系的探讨,将读者带入到城市社会史的学术史。最后,“导读”还评论了西方有关苏州城市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美国学者柯必德的《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一书。阅读“导读”,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牟文,而且可以使读者进入国际城市社会史与苏州城市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导读”出自城市史研究专家、苏州科技大学张笑川教授与合作者之手,评论十分到位。

郭松义先生《农民进城和我国早期城市化——历史的追索与思考》一文从城市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角度,对明清城市史的研究作了新的尝试。郭先生认为,明清时期出现的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特别是往中心城市集中,可以视为早期城市化。我的“导读”介绍了郭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读者联系郭先生对于清代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研究;同时补充了与郭先生原文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以深化对于郭先生原文的认识。

贺萧(Gail Hershatter)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学特聘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2011—2012)。主要从事1800年至今妇女和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她的成名作《天津工人,1900—1949》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201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首次推出中译本。贺萧的研究,受到了新劳工史理论的重要开拓者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深刻影响。汤普森主张从工人生活史当中寻找工人阶级形成的线索,着力于探讨英国工匠在进入工业资本形成时期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惯习以及联合的模式。贺萧在《天津工人,1900—1949》,特别是第七章《大鼓书与鬼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尤其体现出由生活探讨工人阶层的特色,从而也将读者带入天津的城市社会与城市生活。“导读”很好地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强大学术影响导入美国关于中国的新劳工史研究,显

示出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研究的学术背景与理论资源。在准确介绍贺萧关于工人研究的关注外,还特地从城市史的视野加以导读,引导读者对于贺萧这部经典的新理解。不仅如此,“导读”还介绍了相关的天津城市工人研究,以便读者把握研究现状,了解后续研究对于贺萧研究的突破与发展。“导读”的论述涉及近代上海的城市研究,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研究的整体把握。“导读”作者、苏州科技大学许哲娜,原是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对天津近代城市史颇有研究,又恰是贺萧原著的中文译者,她对于原著有准确把握就再自然不过了。

最后,衷心感谢本书所选论文原作者慨然允诺授权出版,衷心感谢撰写导读各位学者的精心之作!

常建华

2020年1月于津门



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 / 王子今	... 1
《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导读 / 徐 畅	... 23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	
——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 / [日] 妹尾达彦	... 38
《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 分析为中心》导读 / 夏 炎	... 76
宋代城市的发展瓶颈 / 包伟民	... 84
《宋代城市的发展瓶颈》导读 / 杨 芹 周 鑫	... 115
中国城市史一千年：苏州城的形态、时间和空间 观念 / [美] 牟复礼	... 135
《中国城市史一千年：苏州城的形态、时间和空间 观念》导读 / 张笑川 陈亚杰	... 165
农民进城和我国早期城市化	
——历史的追索与思考 / 郭松义	... 188

- 《农民进城和我国早期城市化——历史的追索与思考》导读 / 常建华 ... 208
- 大鼓书与鬼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 / [美] 贺 萧 ... 220
- 《大鼓书与鬼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导读 / 许哲娜 ... 253

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

王子今

西汉长安有公众活动利用都市空间的记载。都市结构服务普通居民的若干要素开始初步具备。都市社会生活实现了历史的进步。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西汉长安城内，宫室、宗庙和官署占全城面积三分之二以上”，规模巨大的“皇宫、宗庙、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侯王、列侯、郡主的邸第，占据了长安城的绝大部分”。^①西汉长安城内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共空间因而相对有限。西汉长安因宫殿区的规模宏大，使得都市功能的全面实现不得不以诸陵邑作为必要的补充。

东汉洛阳则已经有更为充裕的公众活动场所。较多人数的集会具有了基本条件。比较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的城市结构，公共空间的规模有显著的区别。城市史的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变化，也体现了汉代都市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的若干历史特征。

阙：标志性建筑与公众集会场地

萧何初建长安城，曾经和刘邦发生关于都市规划理念的争执。《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

^①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0、112页。贺业钜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也指出，“（西汉长安）庞大的宫殿区”“配合府库、官署和府第等，规划用地之多，几占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不仅如此，而且又在毗邻未央宫的西城垣外，营建了‘千门万户’的宏伟壮丽的建章宫，并通过跨越西城垣的复道与城内诸宫连成一片，进一步显现了宫廷区在全城规划中的庞大分量”。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323—324页。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①高祖乃说。

关于未央宫建设工程，首先说到“立东阙、北阙”，甚至置于未央宫“前殿”之前，可知“阙”在宫殿区规划中的重要性。张守节《正义》：“颜师古云：‘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按：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秦都咸阳的建设，曾经首先注重“阙”的修筑。《史记》卷五《秦本纪》：“（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张守节《正义》：“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卷六八《商君列传》：“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司马贞《索隐》：“冀阙，即魏阙也。冀，记也。记列教令当于此门阙。”《商君列传》又记载赵良和商鞅有关“治秦”行政的讨论。商鞅自谓：“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则批评道：“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以为功也。”双方都重视“大筑冀阙”事。阙，是宫殿标志性建筑。西汉宫阙基于“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考虑，又为了容留“上书奏事谒见之徒”，前面应有较宽阔场地，应是汉长安城值得重视的公共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人们从外地要进入未央宫，多数还是从宣平门或横门入城，经横门大街南下进未央宫北阙，或者再经安门大街南下进未央宫东阙”。^②

《商君列传》司马贞《索隐》所谓“记列教令当于此门阙”，指出宫阙是公布政令的地方。而西汉长安发生的有意扩大政治影响的公众

① 实际上所谓“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设想，并没有阻挡汉武帝时代宫殿的扩建，建章宫甚至超越了汉初的长安城区。但是汉长安城的建设确实超越前代，其许多特点“也是以后所少见的”。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②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集会,也因同样思路,专意利用了“阙”前空间。《汉书》卷七二《鲍宣传》记载了汉哀帝时代发生的一次太学生运动:

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鲍)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①,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②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③

这次集会,是以“守阙上书”的形式进行的。^④阙前的场地,可以容纳“诸生会者千余人”。

有学者在讨论汉长安城“城市分区规划”时指出,“汉长安城也和渭北咸阳故城一样,实系由以宫为主之政治活动中心和以市为主之经济活动中心两个综合区(规划结构单元)所组成”。^⑤“阙”是宫廷的显著标志,也是这两个“综合区(规划结构单元)”的标志性界点。

《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记载了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巫蛊之祸”情景,说太子刘据“殴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中国古代罕见的正规军镇压都城市众的政治事件中最惨烈的决战,就发生在长乐宫“西阙下”。这可能与刘据举事得到卫皇后赞许,所控制的基本武装是“长乐宫卫”有关。^⑥而

① 中华书局标点本作“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义不通。

② 《山堂肆考》卷一〇六“举幡救鲍宣”条:“汉司隶校尉鲍宣,字子都,以摧辱宰相下廷尉。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诸生会者千余人。”“王咸”应是“王咸”误写。

③ 《前汉纪》卷二九关于太学诸生请愿具体情节的记载,文字表述略有不同:“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立此幡下。’会者千余人,守阙上书,遂免宣抵罪减死一等。”

④ 参看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唐都学刊》2008年6期。

⑤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⑥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罢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中扰乱。”颜师古注:“中厩,皇后车马所在也。”

“长乐西阙下”能够成为会战战场，自然应当有相对广阔的对阵空间。

九年之后，汉昭帝始元五年（前 82），一位自称卫太子刘据的可疑男子突然出现。《汉书》卷七一《隗不疑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旒，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

这是“北阙”前可以集会“数万人”的史例。而假冒的“卫太子”“诣北阙”，又有“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城市公众行为动辄有多达“数万众”“数万人”集中的记载，也可以为我们推算长安户口数字，认识长安社会生活提供某种参考。而对于“阙”在都市建筑体系中的特殊作用，也因此可以加深理解。

汉宣帝五凤二年（前 56），“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① 也是一则类似的阙下“吏民聚观”的记载，只是没有人数的估计。不过，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阙”，是西汉长安社会公众可以自由聚合的场所。

太学规模与王莽时代 征天下学者的京师学术会议

太学的规模，西汉历代逐步扩大。汉武帝元朔五年（前 124）创建太学。虽然最初的太学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汉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前说“王咸举幡太学下”“诸生会者千余人”事，似说明“太学下”自有集合“千余人”的场地。

^① 《汉书》卷八《宣帝纪》。

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①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记载元始四年(4)事:“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讖、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群臣奏言:‘昔周公奉继体之嗣,据上公之尊,然犹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堕废千载莫能兴,今安汉公起于第家,辅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烂然。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临赋营筑,越若翊辛丑,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在按照儒学经典的理想主义规划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开始注意进行学术层次的建设。李约瑟说,“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可以看作在王莽的倡议下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②

关于这次“科学专家会议”,《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关于与会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言“至者数千人”。而《资治通鉴》卷三六“汉平帝元始四年”取《王莽传》“至者前后千数”说。

这次“会议”参与人即使按照《王莽传》的说法,非“数千”而为“千数”,规模也值得关注。人们自然会联想,这些来自各地的“天下异能之士”是以“皆诣公车”“在所为驾一封轺传”的形式集中到长安城中的^③,

① 《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王铃协助,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2—113页。

③ 对于“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颜师古注:“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师古曰:‘以一马驾轺车而乘传。’李约瑟的理解是“每辆马车上加套第二匹马(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标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第113页。

他们的食宿接待以及会议场所等条件,也都应当有相当高的水准。

辟雍：礼学空间的考古探索

我们还注意到,“营筑”“明堂、辟雍”的工程,“诸生、庶民大和会,十万众并集,平作二旬,大功毕成”,也是一次长安人众集合的特殊史例。其形势,可以和长安城市史初期汉惠帝时代“营筑”长安城垣的工程相比。“城长安”工程“三十日罢”^①,或称“速罢”^②,王莽时代的这一礼制建筑工程“平作二旬,大功毕成”,也可以看作“速罢”,施工管理的效率应当是相当高的。与“城长安”的工程有所不同,“十万众并集”于“明堂、辟雍”有限的工作场地,人员的密集程度是惊人的。

我们可以试探以完工之后的“辟雍”的建筑形制作为局部资料讨论汉长安城公共空间的情形。

从考古发掘获得的关于“辟雍”的遗迹资料看,“圜水沟”内的圆形空间,“其直径东西 368 米、南北 349 米”,总面积约 100 941 平方米。有论著称“总占地面积达 11 万余平方米”。^③ 中心建筑“南北通长 42、东西 42.4 米”。除去中心建筑及围墙、四门和四角配房^④,空地面积仍有约 98 050 平方米。大致相当于现今北京天安门广场面积的 25.81%,对应当时长安人口总数^⑤,规模可以说已经相当可观。只不过,其性质是皇家礼制建筑,而并非民众可以随意集会的社会公共空间。

①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汉书》卷二《惠帝纪》：“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长安城成。”《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惠帝五年）先是发民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是岁城乃成。”

② 《汉书》卷二《惠帝纪》颜师古注：“郑氏曰：‘城一面，故速罢。’”

③ 刘叙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430页。

④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第九章《大土门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97—207页。

⑤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京兆尹”条：“长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

然而,比照发生在王莽“营筑”“明堂、辟雍”52年之后,建武中元元年(56)汉明帝即位初于辟雍“亲行其礼”又正坐讲学,回答诸儒提问,“观听者盖亿万计”的情形^①,可以推想长安辟雍空间的设计思路,或许也有容纳众多群众的考虑。

长安的“市”与服务业经营

西汉末年太学的扩建,有“为学者筑舍万区”的记载。随后的文字,就是“作市”。长安的“市”,自是最为典型的公共空间。对于长安的“市”的位置尚多有争议,然而,以为“市”应当“适应居民需要”,临近“居民聚集之区”的分析^②,是合理的。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皇帝六年)“立大市”,(惠帝六年)“立太仓、西市”。《汉书》卷二《惠帝纪》:(惠帝六年)“起长安西市”。有学者指出,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与未央宫均营造于西汉初期,“建筑于高祖和惠帝时期,属于统一规划的布局”,体现出“面朝后市”的原则。^③可知“市”的营建,是受到重视的。不过,按照礼制传统规划的“市”,管制的严格压抑了经济的自由性。^④

汉长安城的“市”的设置,讨论多集中于所谓“九市”的位置。^⑤也有学者认为,“九市”可能只是约数,长安市场的数量可能会超过“九市”。^⑥或说汉长安城并非只有“九市”,文献中记载的“九市”当指汉

①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

②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

④ 傅筑夫指出:“市是城的一部分,城既然是官家根据自身统治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不是自由发展而成的,则城中市当然也是由官家设立,并且是由官家管理的。”因而不可能“是自治的和自由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

⑤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孟凡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运勇:《再论西汉长安布局及其形成原因》,《考古》1992年7期。

⑥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10期。

长安城九个主要的且有一定规模的市场。^①

班固《西都赋》以十分热烈的语调形容长安城区的“市”的繁荣：

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阊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於姬姜。^②

《文选》卷一李善注：“《汉宫阙疏》曰：‘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张衡《西京赋》也有类似文字：

尔乃廓开九市，通闾带闾，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遑鄙，何必昏于作劳，邪赢优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

汉赋作品多夸张虚饰。从西汉长安城市布局看，“市”的所在空间十分有限。而且又限于人口数量，似乎不大可能出现“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的景况。人们首先会考虑，东汉学者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有关“市”的文字，很可能不免掺杂有对东汉洛阳的“市”的文化感觉。然而据《汉书》卷七六《张敞传》，“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张敞“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可见“市”中商贾数量可观，当绝不止一般约数所谓“百贾”或“商贾百族”。又如《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说“巫蛊之祸”情节：“太子引兵去，殴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

① 何岁利：《汉唐长安城市市场探析》，《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 《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